

## 来自两会的声音

## 杨晓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体系

我们都知道,中国当下的文艺创作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匹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时期的暂时局面,应从多方面综合努力,必将有所改观。

应尽快改变中国艺术教育的西方模式。中国当下的艺术教育框架基本来自于上世纪先学习欧洲、之后全盘学习苏联而形成。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民族传统的重视使人认识到传统的重要性,同时西方现代艺术的积极探索也为我们教育增添了新内容,但总体构架仍然是苏联模式,众多艺术学院的基础课程大部分采取的还是西方模式和课程结构,这种现状与今天我们文化自信的强调相去甚远。建议教育部要重视艺术和艺术教育的特殊性,尽快组织各方面专家根据时代和国情的要求,从历

史的高度以中国优秀文化为主体,高屋建瓴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体系工程,时不我待,功在千秋。

艺术学院要以实践教学为主体,研究辅之。艺术研究应该更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在艺术院校史论系和综合大学展开研究是其主要途径。但长期以来,艺术学院一直被当做一般学科对待,不注重实践,以研究类成果衡量水平(比如美术学院也以论文论学位、评职称),长此以往,艺术院校必将变为研究院,没有实践的“曹雪芹”,就没有研究的“红学家”。没有了实践的研究将破坏艺术的发展,情况严重,尽管教育部也采取了默许“实践类博士”的做法,但也无济于事。建议教育部重视此事,真正坐下来解决,按照学科发展规律办事。

由于历史的原因,哲学社科和文学艺术类专业一直没有建立起院士制度,经过新中国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按照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设立文学艺术类院士的荣誉制度很有必要,设立“高峰”平台,就有高标准、高要求。同时,在专业职称评定中,文学艺术类没有正高职称的做法也不合理,这些都希望有关部门根据时代需求,认真考虑解决。

(作者系中国美协副主席,画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成为每个文化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些年全球化的冲击以及“去中国化”的发展对台湾出版业及社会文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互联网的兴起占用了阅读时间,出版机构逐年萎缩,作者版税不断下降,简体版读物上架率极低等。7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对两岸关系和发展充满信心,不断推动两岸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在国际竞争激烈,文化入侵日益严峻的今天,对港澳台地区出版业的支持不仅可以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在新时代携手同心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篇章,更是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一大推动力。

为此,我建议要加强对港澳台地区版权输出的奖励和支持。近些年国家相关领导、机构对中国大陆出版社的版权输出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设立了“经典中国”“丝路书香”“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多种资助项目,但主要针对的是输出到欧美各国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图书版权。加强对港澳台地区版权输出的奖励及支持认可,既有利于大陆出版业外向型业务的拓展,也能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既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也使得中华文化得以传播。

进一步推进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出版简转繁工作。现今,台湾当局以“去中国化”为主的政治措施,拆分两岸的血脉、情感,以达到分裂国土的目的,其行径值得警惕。基于当前形式,务必要强化台湾是中华文化一部分的认同感,使其明确自己的根源,进而能有身为中华文化、中国一分子的认同。因此,进一步推进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出版简转繁工作,也是深化两岸未来统一的重要心理及文化工作。将大陆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简体版出版物,转为繁体版在台湾出版、发行,不仅有助台湾同胞对大陆的了解,更是极具中国意识的任务和工作。尤其对于以“绘本”“连环画”等形式出版的图书,简转繁的工作更具积极、深远的意义:在孩子们幼儿、少儿、青少年各主要成长阶段及意识形成时期,为其心灵打下中华文化的根基,随着他们的成长,文化之根日渐深入人心,也就更能体悟到自己身为中华文化的一份子。

“两岸同胞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教育后人,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出版物的简转繁是应要全力推进的一项工作,甚至可以将其作为长期的“希望工程”持续推进。希望政府以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为基点,加强对出版业的支持及对相关项目的推进,为强化国家软实力,达到两岸互利共赢,振兴中华助力。

(作者系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书法家)

## 林阳:加强对版权输出的奖励和支持



## 董希源:推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沿“一带一路”走出去

讲,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举国上下共同关注“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推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书画艺术沿“一带一路”走出去,必将发挥艺术交流的纽带作用、肩负起更重要的交流使命。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近年来,我多次参加中国美协等机构组织的书画艺术海外交流活动,如“艺术与和平”主题与“一带一路”主题美术作品创作展览活动等。在此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加大中国书画艺术在海外交流步伐的必要性。特别是去年,我应邀到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写生采访与艺术交流活动时,与当地艺术家和侨胞广泛接触、深入交流,感觉到他们对对中国书画艺术有很强烈的了解需求,特别是华侨华人,非常渴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自觉担当起文化使者的任务。因此我们应支持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沿“一带一路”进一步走出去,在讲好中国故事、阐

述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让世界人民通过欣赏中国书画艺术作品来读懂和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此,要支持并引导中国艺术家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集中创作出一批作品,展示沿线国家的风土人情、优美生态,真实地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多方交往的良好态势。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举办中国美术作品巡回展览,出版多语种版的中国画册,充分利用现有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美术馆联盟等机构和多媒体等现代传播技术平台,推介中国优秀的艺术作品,举办美术普及型讲座和培训班,以增强中国文化和美术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对中国的艺术家尤其是自由职业艺术家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艺术创作与交流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自由职业艺术家是一支活跃在艺术创作第一线的队伍,是对外文化交流的潜在有生力量,更具有传承发展传播中华文化的热爱与担当,但参与对外文化交流的机会与渠道相对缺乏,建议有关部门在组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中,给予自由职业艺术家更多的参与机会,并以具体的组织指导和必要的经济支持。

此外,希望条件成熟时,成立“新文艺群体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为自由职业艺术家给予精准支持和帮助,形成全社会多渠道扶持鼓励优秀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建议主管部门设立专项资金,资助自由职业美术工作者进行“一带一路”美术主题创作交流活动。还有就是建议各美术学院增加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美术专业留学生,尤其招收海外华侨华人学生,提供必要的奖励与艺术,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和艺术,培养高层次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美术使者。

(作者系福建省美协副主席,画家)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6年。6年来,“一带一路”朋友圈成绩斐然。之所以在短短时间内成果显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民心相通”。而实现民心相通,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便是文化交流。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制度不同,故以文化艺术为媒介的交流和沟通尤显重要。近几年来,习近平主席每次出访,都很好地借助自己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融通中外,兼论中西,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展示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成果,让各国人民更好地触摸中华文化脉搏,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 记忆星尘——纪念周海婴



3月2日,“记忆星尘——纪念周海婴诞辰九十周年摄影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该展是2019年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也是中国美术馆“影像中国”摄影收藏项目之一。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周海婴的摄影作品,共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家族:爱的记忆”“周海婴收藏鲁迅及家族照片”“上海:弄堂时光”“东北:红色之旅”“北京:安居乐业”“绍兴:乡音难忘”。展陈空间的设计以“温暖记忆”为主题,主视觉形象借鉴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书籍设计语言,“文武线”“乌丝栏”等视觉元素结合展览主题融合现代手法展开设计,使得展陈空间氛围更具书卷气及时代感。

周海婴(1929—2011)是鲁迅和许广平的独子,他自幼喜欢摄影,10岁开始拍照,14岁时正式学习摄影。周海婴一生拍摄了数万张底片,在这些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家族的私人影像,可以看到社会“众生相”,可以看到时代变迁,市井百态。周海婴的摄影作品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从家庭到社会,从个人到集体,应有尽有,更有历次政治事件的场面和细节。他的摄影作品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图像所体现的敏感与活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和人们的生存环境,是中国现代史上摄影文化出色的呈现。

## 艺术家徐淳君个展

近日,以“经验与non-symmetry”为主题的徐淳君个展在北京798凤凰含章艺术中心举行。本次展览由凤凰出版传媒公司、凤凰含章文化传媒和凤凰含章艺术中心主办。展览展出了艺术家徐淳君创作的版画作品21件,还展出了绝版油印套色木刻版画,它突破了传统套色木刻的制作程序,将所有的色版都集中在一块版上,采用边印边刻,逐版递减的创作方式来完成。这种方刻印版的过程是自然毁版的过程,作品完成后原版已无法再印出作品,因而通常称之为绝版油印套色木刻版画。



徐淳君表示,展览主题在与观众共同探索创作与观看的错

位,因而展出了一部分符合大众观画经验的作品,同时展出以自己的理念来实践的版画作品。本次展览的学术顾问黄丹庵认为,徐淳君的作品色彩丰富、物象复杂、内容多元,很好地将物象与心象统一在画面之中。

## 从模仿到抄袭的个案说明当代艺术的发展在中国的问题

□陈履生

30年前,叶永青在访谈中说了下面这段话:“我常常像候鸟般迁徙于几个城市的生活,弄得我居无定所,四分五裂,我作画和搞作品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的作画方式和习惯乃至作画工具、材料都很‘业余’,在‘画家’这个职业中,我的选择也日趋边缘。近几年,我的兴趣也是零零星星,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幻觉:我在丝绸上罗列和堆砌的这些碎片式的图像和日常之物,举手一挥,便满地鸡毛飞扬而去,仿佛一切都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些中不中、洋不洋、今不今、古不古的东西,实在是生活的不堪和无奈。”——这可以说是这一代艺术家的写照。这一批艺术家有着特殊的生活背景和社会背景,早年的淳朴以及对艺术的真挚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不满于几十年如一日的约定俗成的艺术方式,希望用新的艺术来颠覆过去,并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自己,所以,他们中的一批不安分的青年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北漂”到了北京。时至今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艺术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回首过去,他们在艺术上的反叛精神仍然是值得尊敬的。

如果把把这个时间再往前推10年到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星星美展”,出现了一批聚集在圆明园被称为“盲流”的艺术家群体,他们几经辗转,从不被理解、不被认同,到后来的声势壮大,昂首阔步,趾高气扬,尤其是在市场的支撑下有了一定的威势,虽然没有成为主流,却进入了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特别的“次主流”,成为一种特别的艺术现象。近年来,借助于国际艺术界以及在国内外商业上的成功,中国当代艺术红了半边天,体制外的艺术家通过各种渠道跻身到体制内,借助国际化的气势获得了特别的身份,这又恰恰吻合了“走出去”的大潮,所以,风云际会中是一种逢其时的契机。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春节刚过,红色的喜庆依然荡漾着新春的气息,可是,平地一声惊雷,2月24日,比利时画家西尔万(Christian Silvain)通过媒体发声,指控中国艺术家叶永青抄袭其画作。实际上西尔万早在1996年就看到了叶永青抄袭自己的作品。后来,“在伦敦一家画廊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上看到了我的作品,这次的画自然也不是我的——又是叶永青。我的基金会叫停了这两次展览。”再后来,“我的基金会发现抄袭画作被挂在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于是迅速联系了拍卖行,他们也承诺会对作品进行调查,但直到2018年,这批作品依然在拍卖状态。”直到西尔万看到叶永青的作品在欧洲拍出了60万欧元,是自己的100倍,这下

他在忍了20多年之后,忍无可忍,再也不忍了。他通过媒体发声而让大家猝不及防,目瞪口呆。可以说这是40年来与国际艺术界关联而在国内引起广泛高度关注的最为特别的艺术事件,没有之一。

到目前为止,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事件的性质基本上都很清楚,尽管还存在着少数的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和主流的看法是一致的。抄袭就是抄袭,因为就绘画和当代艺术的一般认知,以及人们对艺术创造的认识,尤其是图像比较的直接性,一般性的鉴别都比较容易。所以,就这一事件的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只会增加笑话中的笑话。目前,当代艺术界中的艺术家、曾经评论过叶永青的评论家,收藏过叶永青作品的收藏家,纷纷表态这是一起严重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形象的抄袭事件。3月7日,在时隔10余天之后,四川美术学院在学术舆论的压力下,终于发表声明,“对学术不端等师德问题坚决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属于该院的叶永青教授“涉嫌抄袭”,表示“依规依纪开展核查工作”。而此前,主流媒体以及网上已经是铺天盖地,深度发酵。相比较去年四月的红点奖抄袭事件,西安美院在4天之内迅速表态并作出辞退抄袭者的决定,本次的被动确实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一般之处。

眼看着楼塌了,眼看着城中失火不仅仅是殃及池鱼,而是殃及了整个城池。如果从坏事变好事的角度来看,借此来反省中国当代艺术至少在30年内的发展历程,应该也是一个由外而内的契机。30年前,当原本属于“盲流”的艺术家进入到中国美术馆这一国家殿堂,那时人们就质疑过他们对西方的模仿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对主流价值观和美的颠覆。可是,当时没有人愿意承认这是模仿,鼓动的评论家也用各种方式来辩解,但都忌讳所谓“模仿”。在“重要的不是艺术”这一口号下,虽然人们普遍的想获得“重要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而在“观念”的掩护下,包括极端的艺术行为也令人瞠目结舌。当祭起了“后现代主义”的大旗,好像与艺术相关或不相关的所有的不辨、不识、不解都可以囊入其中,也可以作为不解之解。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历史的阶段,模仿作为学习西方当代艺术的开始,走过这个过程就可以建立起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体系,从而堂堂正正地行走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成为一种外向型的艺术。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模仿却走向了抄袭这一窘境,又暴露了知识和道德的缺陷,还捅破了与商业联手的那层窗户纸。应该说,这原本是关于一位艺术家的个案,却把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都牵扯了进去。显然,这一个案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也反映了30多年来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下极

度市场化、被商业绑架的现实。

当代艺术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印象派、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历史表现在巴黎的卢浮宫、奥赛、蓬皮杜这三大博物馆之中,而在巴黎又表现在德拉克罗瓦、罗丹、莫奈、毕加索等具有个案性的艺术家的博物馆中。而打破这一秩序的是杜尚把小便池搬到了展厅,并且进入到各种记载这一历史的著作之中。而战后美国艺术新的发展,直到波普等后现代艺术的兴起,又造就了一道新的艺术景观。从根本上看,其艺术发展是内部的自觉、逻辑和西方社会的发展相吻合,并逐步建立起了相应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商业的运作方式,并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发展基础和历史过程,所反映的变化是突如其来,因此,学术上缺少支撑,艺术上只能是模仿。相似的只是指向过去的颠覆。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大概只用了10余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从“现代”到“当代”的百年发展历程。可是,建立在西方制定的标准之中的中国当代艺术,所缺的是金字塔的基础,没有基础就不可能有塔尖。所以,我们只能在西方的规则中寻找发展的方向,并需要西方的认同。因此,中国当代艺术家积极参加国外的各种双年展,寻求接纳,并积极表现,同时,通过商业代理人介入到市场之中,通过擅长的与艺术无关的市场手段获得一定的身份地位。因此,出现抄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抄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商业对于艺术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话语模式,同样受到西方的严重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的转化是在翻译的引导下,出现了中国式的创造——看不懂、弄不清即“高深”。因此,皇帝的新装层出不穷,并乐此不疲。文字的晦涩与游戏,理论的缠绕与含混,使得这种自成一体的批评成了今天混淆模仿与抄袭的一种手段。无疑,理论和批评的推波助澜,使得一些模仿西方的当代艺术家迷失了方向,真假成真。

西尔万最近在一篇颇具针对性的文章中说:“在过去的古希腊和罗马,‘抄袭’行为并非不可饶恕,模仿、借鉴前人的画作是可行的。然而,要想使自己模仿而来的作品登上艺术的大雅之堂,作品本身必须经过再创作和再加工,即我在采访中曾提到的——‘为艺术增值’。”这非常简单地说明了模仿与抄袭的区别,而作为艺术家连这最基本的区别都不清楚,作为与艺术关联的批评家、策展人、画商连这个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则可充分说明当代艺术发展在中国的问题,是当代艺术基础的缺失和浅薄。

## 视觉前沿